

服务经济译丛

主编 江小涓 薛 澜
总校译 许德金

服务部门产出的测算
Output Measurement in the
Service Sectors

[美] 兹维·格瑞里奇斯 主编
程大中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服务经济译丛

主 编 江小涓 薛 澜

总校译 许德金

服务部门产出的测算
Output Measurement in the
Service Sectors

[美] 兹维·格瑞里奇斯 主编

程大中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服务部门产出的测算/(美)格瑞里奇斯主编;程
大中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服务经济译丛)

ISBN 978-7-5432-2214-4

I. ①服… II. ①格… ②程… III. ①服务业-投入
产出-测算-文集 IV. ①F7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1097 号

责任编辑 王 静

装帧设计 陈 楠

服务经济译丛

服务部门产出的测算

[美]兹维·格瑞里奇斯 主编

程大中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0.75

插 页 4

字 数 488,000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214-4/F·610

定 价 68.00 元

服务经济理论的引进借鉴和创新发展

——对“服务经济译丛”的几点说明

“服务经济译丛”即将出版。现将出版宗旨、选书标准和丛书主要内容简介如下。

从经济理论研究的角度观察,“服务”与“商品”的性质有很大差异。服务的定义和测度方法,服务业的劳动分工、规模经济和生产率变化等都有独特性,服务业还广泛涉及一些超经济、非经济的问题。服务业加快发展的含义及其对增长、就业、物价、收入分配和国民福利的影响,比物质产品为主的时期更复杂。理解服务经济,找到适宜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需要长期理论研究的积累和支撑。

与经济学其他领域相比,我国服务经济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导致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国外服务经济理论的引入和借鉴不足。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较早,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因而服务经济理论研究也发展较早,相对成熟。翻译一批国外经典文献,是促进我国服务经济理论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丛书首批译著共有 15 本书,其中服务经济理论有 6 本,服务行业研究有 6 本,服务全球化研究有 3 本。下面分三个方面,对各本译著的主要内容做一概要介绍,并就理解服务经济特殊性的角度和思路做一些探讨。

一、服务经济理论及相关测度和统计问题

研究服务经济时,最先碰到的困惑往往是服务的独特性质、服务体系的构成和服务业中不同行业的性质差异。服务的本质特点是非物质性,即服务的结果不是有形产品。服务业既包括传统“纯劳务”型的家庭服务、保安服务等,也包括资金、技术高度密集的信息服务和知识含量很高的研发、创意服务等,还包括教育、文化、卫生以及社会管理和政府部门等公共属性很强,市场失灵比较突出的各种服务。不同类型服务业的经济性质很不相同。传统劳务型服务业缺乏规模经济,技术含量低,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而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却具备了技术含量高、规模经济显著、劳动生产率提高快的特征。其中电信网络服务等更具有网络外部性等独特的市场特征。

服务经济的上述特征给理论研究带来不少难题,也导致了一些易误易谬的问题。举几个典型

例子。一是对服务业比重上升的多重含义理解不足。在不少服务业特别是以提供劳务为主的服务业中,劳动生产率上涨缓慢甚至“停滞”,劳动成本的上涨直接传递为服务价格的上涨,此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上升并不是服务量的实质增长,而只是服务价格上升相对较快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成本病模型”,已经成为服务经济研究基本出发点之一。但是,国内许多方面包括不少研究者对其理解不足,在主张服务业加快发展的同时,却对“非生产加工环节”在产品价值链中比重上升、服务价格持续较快上涨等现象难以接受。然而,服务业比重上升这种宏观趋势的微观表现,就是产品价值链中服务环节所占比重的上升,不可能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二是对精神和心理需求在服务业发展中的重要性理解不足。在实物经济为主的时期,人们追求食品、服装、汽车、住宅等“物品”,推动了经济发展。而服务经济比重上升,意味着未来的经济增长取决于精神和心理消费在消费总额中比例的上升。如果认为“商品”与“服务”在经济发展中同等重要,就要承认物质和非物质两种消费行为同样重要:爱迪生发明的电灯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消费需求,任天堂的游戏和迪斯尼的米老鼠满足了人们的娱乐消费需求,然而这种理念远未形成共识。三是服务业的“共性”难以概括,服务业各个行业性质和特点差异大,反映服务业一般特征的普适分析框架不易构造。四是服务业测度和统计困难,服务业统计中存在的缺口和缺陷相对较多。在各国经济统计中,服务经济都是遗漏较多的部门,我国也不例外。

本译丛中主要讨论上述服务经济基本问题的有6本著作。《服务经济思想史——三个世纪的争论》(*Services in Economic Thought: Three Centuries of Debate*)是关于服务业经济理论演进的经典综述。作者对三个世纪以来服务经济思想的发展作了梳理,引述了近百位学者的观点,并对各种理论观点进行比较分析。在结尾部分,作者提出了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今天来看,大部分仍然是服务经济理论研究中最有挑战和最有意义的问题。《服务部门产出的测算》(*Output Measurement in the Service Sectors*)是一本论文集,涉及服务业核算中的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内容包括:使用修正过的数据测算服务部门的产出,服务行业的生产率测算,6个特定服务行业产出的测算等。此外,

还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服务业的微观基础、服务业的国际比较以及公共部门四个角度,讨论服务部门的统计测算及其影响。《服务业的增长——成本激增与持久需求之间的悖论》(*The Growth of Service Industries: The Paradox of Exploding Costs and Persistent Demand*)是一本论文集,作者使用多种方法对服务业生产率进行重新测算,探讨服务业成本病是否依然存在、服务业真实产出份额是否下降、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等问题。建立“成本病模型”的鲍莫尔教授是本书第一章的作者,他根据新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服务业成本病的存在。《服务业——生产率与增长》(*The Service Sector: Productivity and Growth*)也是一本论文集,焦点集中在与服务业增长和生产率有关的问题上,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生产率的影响,服务业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服务业较低的技术变化速度和持续的通货膨胀压力之间的关系等。《生产率——信息技术与美国经济复苏》(*Productiv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Growth Resurgence*)一书,阐述了自1995年以来,信息技术对美国及全球经济体系所带来的影响,追溯美国经济复苏性增长的源头。作者使用数量分析方法,评估1989—2004年间信息技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者在书中所用的方法,已成为生产力测算的国际标准,这项研究也成为分析信息技术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一个范本。《服务业的生产率、创新与知识——新经济与社会经济方法》(*Productivity,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in Services: New Economic and Socio-Economic Approaches*)是一本论文集,鲍莫尔为此书作序并撰写了其中一章。书中论文聚焦于服务业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关系,讨论的内容包括服务业增长滞后的真实性问题,生产率概念在服务业中的误用问题等。书中还有若干章研究服务业的创新问题,包括知识性服务业的增长和生产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创新中的作用等。

二、若干服务行业研究

服务部门行业繁多,不同行业性质差异很大。译丛首批选择了6本研究特定行业的著作,重点是国内从经济角度特别是服务业这个角度关注不足的行业,如教育、医疗、体育等行业。这些行业

以往主要被归为“社会事业”领域,对其经济性质重视不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愈来愈多的消费者愿意增加教育、文化、卫生等消费支出,使得这些“社会事业”的经济性质明显增强。因此,需要增加经济学的视角,更完整地理解这些行业的多种性质,特别是作为服务产业的性质。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是通过市场配置部分资源的必要性。需要看到,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是真正的免费,而是居民以纳税方式集体付费,以这种方式提供的服务内容,既需要有高度的社会共识,也需要有比较完善的提供网络以保证低收入者也能够平等地分享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例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文化服务等。而许多非基本公共服务消费需求分布不均匀,愈是中高端消费和新拓展的领域,往往较高收入居民消费较多。例如,城市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出农村青年,如果高等教育免费或者财政大幅度补贴,就相当于补贴那些相对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当然,孩子在任何阶段都不应因为家庭贫困而不能接受教育,但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所有阶段的教育都免费,而是通过助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二是借鉴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例如从前些年某项社会事业投入的平均收益率很高这个现实,就认为今后继续增加投入就会获得同样高的回报率,这种方法在社会事业领域的分析中较常见到,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却是用平均收益率取代边际收益率的不当方法。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提高全面素质,肯定有较高的个人和社会回报,继续接受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也可能总体上有正的回报。但是,如果没有跟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有机结合,如果没有能够跟受教育者未来的职业发展需求很好地结合,这种教育服务的投资就有可能回报极低甚至是负回报了。

丛书中有关行业性研究的几本译著,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权衡不同的利益关切,统筹考虑公共资源和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教育与培训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是一本论文集,对教育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有新的扩展与延伸,反映了教育经济学的新进展。研究内容包括各类资源对学生的成绩的影响,对不同年龄段学生进行政策干预的效果,哪些因素影响教育的经济和社会回报等。书中还研究了与职业培训相关的问题。《要钱还是要命——给美国医疗体制的一剂强药》(*Your Money or Your Life: Strong Medicine for America's Health*)

Care System)一书,介绍了美国医疗体系发展的历史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各国医疗体制发展改革中的若干共性问题,讨论的内容涉及如何公平而有效地分配稀缺的医疗资源,如何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卫生服务及医疗融资体制,如何在保证国民健康水平的前提下控制快速增长的医疗开销等问题。书的前半部分回顾了美国近一个世纪以来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成果和存在的缺陷,后半部分通过经济学的视角,为如何解决医疗融资、保险覆盖、支付手段以及成本与质量控制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独到的建议。《旅游和休闲业——塑造未来》(*The Tourism and Leisure Industry: Shaping the Future*)是一本论文集。作者认为,面对经济社会新的重大变化,需要研究这些变化对未来休闲行为的影响。文集的主要内容包括:人口统计变化和休闲时间的变化,生活步伐放缓的要求与全球化加快发展之间的冲突,文化性休闲行为,生活方式的变化,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等,以及这些因素对未来休闲和旅游产业的影响。《体育经济学》(*The Business of Sports*)第一卷和第二卷是两本研究体育经济的论文集,涉及的经济视角包括产业组织、团队所有权、投入产出关系、组织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融资和设施建设、市场化及非市场化收益等。前一本文集的内容包括:美国体育产业概况,体育团队盈利能力,大型赛事对举办地区经济社会的影响,职业运动的收益,数字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体育转播和内容销售方式等方面影响,大学体育发展等。书中有一章专门分析了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状况。后一本文集的内容包括:比赛中的奖金分配问题,体育联盟问题,职业体育中的成本和产出的关系,政府行为和体育活动产生的非市场化收益问题,体育场馆设备的融资问题等。《世界电信经济学》(*World Telecommunications Economics*)是一本关于电信经济学理论和政策问题的概论性著作,可分为电信产业简介、电信经济学理论、管制政策及企业运营四个部分。内容包括:电信业务的供给和需求,电信市场结构及其变化,电信业务运营成本,电信业务价格的确定,电信产业所有权,电信产业的管制政策,电信产业的普遍服务,电信产业经济绩效及服务质量的衡量方法等。

三、服务全球化和服务贸易、服务外包研究

研究服务全球化问题有一些理论特点和现实难点。首先是定义和统计问题。“服务贸易”与

“商品贸易”的含义相差甚远,商品贸易主要的形式是商品的跨境交易,服务贸易却包括服务本身、生产要素、服务提供者或服务消费者中任何一项的跨境移动。服务贸易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过境贸易,即服务产品跨境交易,例如出口影视产品贸易和软件贸易等;二是当地贸易,即服务消费者跨境消费,例如入境旅游、留学生教育等;三是商业存在,即服务供应商跨境提供服务,例如设立外资服务企业;四是自然人过境服务,即服务供应者跨境提供服务,例如从国外聘请教师、医生护士等。由此可见服务贸易定义的宽泛及统计方面的困难。第二,服务外包这种独特贸易形式产生的问题。服务外包影响到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一些重要结论,例如贸易双方的距离已经不是贸易流向的决定因素,对贸易区域分布理论产生影响;例如劳动力“虚拟跨境流动”的现象,即不必发生人员跨境流动,却能向境外提供劳务,减弱了距离、文化差异和各国移民政策等因素对劳动力流动限制所产生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在传统贸易理论中地位重要。第三,人力资本在服务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制造业可以以资本和设备为主要载体实现跨国转移,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过程都需要人直接参与,人的流动是多种类型服务跨境转移最重要的载体。第四,部分服务业具有社会和政治敏感性。对进入诸如文化、传媒、通信、网络等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无论是东道国还是投资方,都要考虑“非经济因素”影响,东道国政府对开放这些行业也相对谨慎,需要权衡利弊,在经济利益和社会成本之间、在开放获益和控制风险之间寻求平衡。

丛书中关于服务全球化方面的译著有 3 本。《国际服务贸易手册》(*A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对服务贸易做了全面介绍。前半部分包括服务贸易相关理论问题的概述,《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影响,服务贸易的基本原理以及不同形态服务贸易的统计方法等。后半部分是若干服务行业的研究,包括金融服务贸易问题,贸易政策对运输服务的影响和作用,国际电信和信息服务贸易协定的谈判,健康服务和健康政策的制定,电子商务的经济规模和监管问题等。《服务业全球化——理论与实践启示》(*Globalization of Services: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Practice*)是一本论文集,除总论外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服务业外商投资产生的背景,包括

紧随客户、市场营销发展、服务可交易性等。第二部分阐述服务业全球化的理论基础和服务业国际化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公司竞争力、声誉、专业服务、创造和传播知识的能力等。第三部分介绍几类服务行业的国际化发展案例,包括航空服务、快递服务、酒店服务等。《21 世纪的外包与离岸外包——一个社会经济学视角》(*Outsourcing and Offshoring in the 21st Century: A Socio-Economic Perspective*)也是一本论文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离岸外包的理论和实践,包括外包的分类、外包方式选择、外包与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电子商务离岸外包等。第二部分是外包决策和风险控制,包括外包决策的分析、外包对风险投资的影响、开放源代码和软件外包问题等。第三部分是印度、德国、西班牙等国别案例分析。书中还有一章专门分析了大型 IT 外包项目“失败”的案例及应该吸取的教训。

最后对丛书的译校者团队作一点简介。

丛书的主编对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已经准备了数年,从近百本备选文献中挑选出 20 本著作,因版权等方面的原因,最后选定了 15 本作为译丛首批著作。本书翻译团队的成员大多数是长期研究服务经济问题、具有高级职称的著名学者,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人民日报社等机构。总校对许德金教授负责组织了以对外经贸大学教师为主的校对团队。为了体现丛书的性质并确保译著质量,翻译工作开始前,译者和校者团队举行过数次工作会议,商议各种细节,形成了丛书统一的规范要求。每本书都经过了三次校对,译者和校者都有过多次沟通,反复修改。总校对除了制订校对的总体方案,还同时承担了所有译著的三校工作,对每本译著均亲自阅读过目,提出具体的意见与建议。我们共同的愿望是,每本译著都能做到意思准确、用语规范、文字流畅。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为丛书的出版提供了资助,CIDEG 的部分学术委员组成了丛书的编委会,对丛书的选择、翻译和出版工作提供学术指导。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陈昕总裁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学术性著作的出版,对这套丛书的出版予以了积极支持,



提出了做好翻译出版工作的具体要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格致出版社负责具体的出版工作,何元龙社长、王伟先生及忻雁翔女士深度参与了这项工作,在译校工作全过程中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各本书的责任编辑耐心细致地编辑每一本书,为丛书的质量把好了最后一关。

衷心感谢所有为丛书的翻译和出版而努力工作的同仁和朋友。

这套丛书还将努力做下去,译介服务经济领域更多的国外经典和前沿文献,推动我国服务经济理论发展和创新,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

江小涓 薛 澜

作为本书的主编,兹维·格里奇斯(Zvi Griliches)生前曾是美国哈佛大学保罗·M·沃伯格经济学教授、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生产率研究项目主任。他于1930年9月12日出生在立陶宛的一个犹太家庭。在二战期间的大屠杀中,他幸免于难但却成了孤儿。1951年,他到了美国,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获得农业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56—1969年,他任职于芝加哥大学;1969年他前往哈佛大学,并在那里任职直至1999年11月4日其辞世。在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格里奇斯在经济学特别是在劳动经济学、经济计量学以及技术和增长经济学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格里奇斯涉猎的研究领域彼此相互联系、一脉相承。他认为,被索洛称为经济增长最重要发动机的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活动的结果;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方向应该跟其他有目的的经济活动一样受制于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对此很少有甚至根本就没有数据支持。^[1]因为技术进步通常由(企业、行业或整个经济水平上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衡量,所以对这些要素投入的测算就变得非常关键。格里奇斯在其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设法处理这样的数据问题以及正确度量经济理论相关变量的方法问题。他还采用企业水平数据以及与企业水平数据相关的专利数据,致力于规模报酬效应以及R&D的生产率效应的测算,开创了使用微观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的先河。他也因此被看作是“现代增长核算的创始人”。^[2]格里奇斯对经济学的贡献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1965年,35岁的格里奇斯获得了美国久负盛誉的克拉克奖。在他去世前,有很多经济学家曾预测他将可能和乔根森(1971年克拉克奖获得者)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3]

在探讨如何准确获取微观和宏观层面的数据方面,格里奇斯对很难测算的部门尤其是服务部门给予了高度关注。事实表明,随着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对服务部门的准确测算日益成为各国国

[1][2] Nerlove, M. (2001). Zvi Griliches, 1930—1999: A Critical Apprecia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111, F422-F448.

[3] Diamond, Arthur M., Jr. (2004). Zvi Griliches's Contributions to the Economics of Technology and Growth.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13, no. 4, June:365—397.

民经济统计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货物部门相比,服务部门在诸如服务产品和服务部门的界定和划分、服务部门(包括投入、产出、价格和生产率)测算中服务质量变化的衡量等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统计困难,使得关于服务部门的数据相对缺乏并存在大量扭曲,进而影响到相关学术研究尤其是经验研究的开展以及经济政策的制订。服务部门的统计核算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美国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并在二战之后调集各方力量包括政府和学术界来试图解决这一难题,格瑞里奇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服务部门产出的测算》一书就是这些努力的重要结晶。本书虽然是一个会议论文集,每篇论文关注不同的主题,但从逻辑结构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讨论美国服务业的官方数据来源及其修正问题,共包括 3 篇论文和 4 篇评论。迈克尔·F. 莫尔的论文讨论了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按行业统计的 GNP 序列数据(或称为生产总值来源, gross product originating, GPO)的最新修正及其对服务部门产出测算的影响。马丁·尼尔·贝利指出,这项改进工作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针对银行和金融服务、医疗服务、保险等价格指数非常薄弱等。埃德温·R. 迪安和肯特·孔泽的论文介绍了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的行业生产率测算项目,其中包括 39 个服务行业。对这些服务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测算主要基于总产出而非增加值,不同于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测算方法。对此, W. 欧文·迪沃特和罗伯特·E. 利普西做了评论。保罗·A. 阿姆奈特和丹尼尔·H. 金斯伯格的论文讨论了美国在构建消费价格指数(CPI)方面所做的改进工作、总结了有关服务价格变化测算的研究。罗伯特·E. 利普西对该论文提出的有关问题包括医疗服务的定价问题进行了反思。

本书的第二部分包括 7 篇论文和 6 篇评论,主要讨论分销、证券、银行、教育、日托和运输等 6 个特定服务行业的测算问题。沃尔特·Y. 奥伊讨论了分销部门的测算问题以及相关经验证据,指出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与消费者之间活动边界的变动使得传统的生产率测算变得既困难又常常具有误导性。舍温·罗森肯定了该篇论文,同时也指出一些不足比如“大规模储备经济”(economy of massed reserves)概念来自排队论,是一种局部均衡分析而非市场均衡分析。蒂莫西·F. 布莱斯

纳罕、保罗·米尔格罗姆和乔纳森·保罗研究了证券市场及相关的经纪、金融和信息服务产出问题。他们发现,证券市场活动对实际生产率的贡献,不管是通过其在经理人薪酬计划中的运用还是通过其对投资决策的影响,都很可能非常小。关于银行业产出测算有2篇论文和3篇评论。其中丹尼斯·J. 菲克斯勒和金伯利·D. 兹翔采用超越对数距离函数(translog distance function),把8种不同金融资产即不同类型的贷款和存款跟3种“传统”投入即劳动力、实物资本和原料联系起来,由此得到的估计结果生成一个关于资金机会成本的序列数据,从而构建出与每种特定资产类型相关的金融服务流。艾伦·N. 伯格和大卫·B. 汉弗莱则使用厚边界成本函数(cost function with a thick-frontier approach)来测算银行的绩效。他们关于银行业普遍低效率的发现受到了弗兰克·C. 怀科夫的挑战,后者把这些低效率理解为可能由区位差异和产品差异所导致的,而这些方面并没有完全被考虑进所估计的成本函数之中。杰克·E. 特里普利特则建议使用享乐方法(hedonic approach)来测算银行业的产出。戴安娜·汉考克则指出,在将加总方法和指数理论应用于银行业之前,首要的问题是确定划分和测算金融服务的方法论,比如确定存款服务是银行的投入还是银行的产出。戴尔·W. 乔根森和巴巴拉·M. 弗劳梅尼开创性地研究了教育部门的产出测算。他们把特定年份的教育系统的产出定义为人力资本的净增加。这一净增的人力资本价值是由通常的工资、年龄和学校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推导出来的。不过,这一方法是基于一些有争议的假设,对此,迈克尔·罗斯柴尔德提出了质疑。斯瓦蒂·慕克吉和安·德莱登·维特的论文是关于日托行业(day-care industry)的。他们采用成本函数框架与儿童小时数作为主要的产出测算方法,并重点开发一种“儿童看护质量”测算方法,该方法基于“花在每个儿童身上的教职员时数”。他们发现,随着儿童看护机构的迅速扩张,质量指数出现了下降。罗伯特·戈登的论文较为详细地回顾了运输部门的产出数据构建,并特别关注铁路和航空运输业以及卡车运输业。他的论文是围绕这些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构建展开的,吸收了其新近开发的资本估计方法。罗宾·C. 西克尔斯认为戈登的工作将成为有关运输部门经验研究的焦点。

第三部分则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服务业的微观基础、服务业的国际比较以及公共部门四个角度讨论服务部门的统计测算及其影响,共包括4篇论文和1篇评论。唐纳德·西格尔和兹维·格瑞里奇斯的论文指出,如果不能正确测算服务业产出的话,那么那些使用服务的行业的生产率测算应该会显示出服务的贡献。他们通过经验分析发现:测算出来的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复苏不能归因于外购服务和国外外包的增加以及行业数据质量的下降;不同4分位水平行业的生产率增长与这些行业在计算机上的投资强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M. 伊沙克·纳德里指出他们的论文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比如未考虑产出减缩指数、工时、能源和就业数据方面可能存在的测算误差以及不同投入测算误差的相互作用等。伊丽莎白·克莱姆普和雅克·迈雷斯使用法国9个服务行业、大约2300多家服务业企业的调查数据,考察法国服务行业绩效在企业水平上的极端易变性,并设法按照异质性的构成因素和内在的离散性对其进行分解。艾伦·赫斯顿和罗伯特·萨默斯的论文仅仅报告了“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的一个方面,即讨论进行服务价格国际比较时出现的问题以及该项目采取的各种解决办法;论文还展示了对1980年60个国家的服务占消费和GDP的名义份额和实际份额的估计。他们发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的实际份额提高甚微,而服务名义份额的上升则主要是由于高收入国家的相对服务价格较高。较高的名义份额并非意味着对这些服务的实际消费较多,而是仅仅意味着对这些服务的支出较多。理查德·默里的论文总结了瑞典试图测算各种公共机构和组织如警察、天气预报、教育和医院的产出和生产率的大规模尝试结果。这一关于瑞典的研究设法提出了结果(outcome)而非投入(input)和生产能力(throughput)的测算方法,并把由此得到的产出测算与使用的总投入包括资本进行比较,从而生成一个针对整个公共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默里发现,在考察期里瑞典大多数公共部门活动的生产率出现了持续而普遍的下降。

格瑞里奇斯主编的这本论文集表明,在“服务”这个总标签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异质性,而且很难较好地把握服务业到底是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正如格瑞里奇斯所言:“如果我们不改进这方

面的测算工作包括提高基本统计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改进用来解读数据的概念框架,那么我们将一无所知。”^[1]他还指出:“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计量技术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如果这些理论和技术未被应用于正确的数据分析,那么将是毫无用处的。”^[2]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无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它不仅会推动服务经济学与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发展,而且也可以为服务业的统计核算工作提供概念基础、分析框架和测算技术。美国在这两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面,尤其在服务业统计核算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细致工作。这非常值得中国学者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尤其是统计部门认真学习和研究。相信本书的翻译出版能够促进国内相关学术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水平的提高,改进中国服务业的统计测算工作和统计数据质量,为推动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服务化转型做出贡献。

最后,我要感谢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江小涓研究员,她的信任和鼓励使得我有机会、有信心承担本书的翻译工作。感谢我的研究生张天添和苏阳,苏阳参与了本书第6章和第7章部分内容的初译,张天添对第8章和第9章进行了初译,我对他们的初译稿进行了修改和重译。除此之外的所有章节均由我一人独自翻译和校对。从2010年初开始到目前,翻译工作历时8个多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翻译这本厚达570页的英文书,我个人认为很不容易。回想起来,在过去250多个日日夜夜里,除了正常的吃饭、睡觉以及学校教学、科研工作外,几乎全部剩余时间都用在了翻译上,一点点往前推进,真正尝到了“愚公移山”的滋味。时间所限,学识短浅,错误在所难免,热忱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程大中

[1] Griliches, Zvi, (1992). *Output Measurement in the Service Sector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21.

[2] Griliches, Zvi, (1994). Productivity, R&D and the Data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1), pp. 1—23.

本书所含论文和讨论的最初版本曾于 1990 年 5 月 4 日至 5 日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的查尔斯顿(Charleston)召开的会议上宣讲过。美国人口普查局(Bureau of the Census)、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美国能源部(U. S. Department of Energy)、美国国税局统计处(Statistics Division of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以及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对“收入与财富研究会议”(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Income and Wealth)提供了资助。我们在此对这些机构的支持表示谢意。

执行委员会(1990 年 5 月)成员名单

查尔斯·赫尔滕,主席

恩斯特·伯恩特

杰弗里·卡琳娜,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代表

卡罗尔·卡森

罗斯安妮·科尔

弗兰克·德莱乌

斯坦利·恩格曼

兹维·格瑞里奇斯,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代表

斯坦利·莱伯高特

罗伯特·利普西

玛丽莲·曼瑟

罗伯特·帕克

舍温·罗森

弗里茨·肖仁

查理斯·韦特